

新認識叢書

1948

第一輯 第五種

論自由主義

宋魚著

新知書局印行

571.94
697

論自由主義

宋魚著



新認識叢書
第一輯。第五種

新知書局



3 0515 5247 3

新 認 識 證 書

第一輯。第五種

論 自 由 主 義

著 者 宋 魚

發 行 人 沈 靜 芷

發 行 者 聯 誼 書 局

特約經售處

上海四川北路一九九九弄
香港軒經詩道三〇四號

漢 口 重 慶 聯 營 書 店

·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

版 初 月 八 年 七 十 三 國 民

論自由主義

目 錄

第一章	自由的由來及其正解	一
第二章	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者的理解	一四
第三章	自由思潮的史的發展	二六
第四章	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	三三
第五章	自由主義的考驗	四八
第六章	自由主義的揚棄	七一

第一章 自由的由來及其正解

一 自由這個名辭的由來

『在中國，知識份子中，自稱爲和被稱爲自由主義的人很不在少數。但自由主義的具體內容到底是什麼呢？却很不易得到明確的概念。有的自稱爲自由主義者的人，又被別的自由主義者斥爲假自由主義者。真假之間，區別又在那裏呢？——這些問題都值得追究。（註一）』

思想界對於自由主義辯論，曾一度熱烈到極點，或在政治主張上辯，或在人生態度上辯，把自由主義當作人生哲學政治哲學的純理論來辯。但誠如胡繩先生所說：『一般所說的真自由主義與假自由主義者，也總是就其實際行動的表現而加以區別的。』（註二）』

我們試從自由主義的理論論辯，展開到實際行動的考驗。

自由，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者，這三個名詞，如果把牠離開了社會政治的原由與諸關係，孤零零的抽出來，照字面解釋，那就變成空洞抽象，沒有內容的東西。真是，假如那末

說：各個人生存權利和個性解放的要求叫自由，和這種要求有關的某些原則叫做自由主義，相信並實踐這些原則的人，就叫做自由主義者。這種說法，看似極妥當，實在是捉摸不定的。實質上，是空洞無物的。夏康農先生說：「因為生活要求，原本就隨時代條件，社會條件，尤其是各人所處的地位條件等等的差別而有不同，那麼自由的具體涵義自然也就有了變化，連帶着，相關的原則與夫相信這些原則的人，自然也就有了差異。」（註三）就是說，自由主義對自由的要求，是隨時，隨地，隨人，各有差別不同，變化進步的，不能是個呆板的原則可以詮釋的。所以，從來談自由主義的人，各人就各自所處的社會生活的地位、條件，感受到的對自由的要求，最低義和最高義，各不相同，一個做生意的人，他對自由的要求是「貿易自由」；一個獨裁者，統治者的自由要求是專制獨斷的自由，剝削榨取的自由；一個軍閥的自由要求，是殺人的自由，「開槍的自由」。前年冬季昆明青年遭受害時，鬪鬥徵就說過他有對學生「開槍的自由」。近代人民大眾的自由要求，是民族的自由，土地的自由……「五花八門」，「百家爭鳴」，個個都自認自己是「真正自由主義者」，別人的都是假的，誰都有那麼一個印象，英法是倡導自由的祖國，我們雖然難忘，當年曾以鴉片販子侵害我們的那件事，有點難為情，但，自由主義仍醉心着「祖傳秘方，別有應驗」的想法。最近來，美國的自由主義和他們的玻璃絲線，一樣在中國最暢銷，中國販子，自然要廣告廣

客們說「星條旗商標爲號，以防假冒」。最可笑的，連到馬歇爾都指斥爲「頑固份子」的，今天也居然署名宣言，自命爲自由主義者呢！

誰都知道，「自由」這個名詞，是近代的外來語，中國舊典籍裏沒有見過的。當然，不是說，中國人，在過去沒有過自由的要求，不過自由二字連起來，成爲一個口語應用，却是近代的事情。

「自由」一辭，雖由法國倡導，但，牠確是各國封建社會末期資產階級反封建民主革命中一般的中心思潮，並非英美法西歐國家的「特產」。近來，一些人們，特別「受美國教育的知識階級」，他們總認爲自由是英美的特產，或者說「應該像在英美流行的自由觀念那樣纔算得自由的正解」正如前文所說，只有英美的自由，才是真正老牌的「祖傳」的自由，這種看法，顯然是「一種錯覺」。

至於說，中國的「自由」一辭，牠深深接受到英美諸國自由的精神的影響，倒沒有說不通。可是，也怪，這些人，他們談拜英美式的自由，却健忘了法國式的自由。辛亥革命當年，中國的自由，說影響的話，陳天華孫中山受影響的，不是他們崇拜的英國式的，反而是被健忘了的法國式的；不是「不流血革命」的妥協的改良的一份，而是流血大革命的一份；不僅如此，英國式所影響的是高唱君主立憲，「保國會」「保皇黨」的康有爲梁啟超，倒不

是「同盟會」，「革命黨」的陳天華孫中山呢？說來也慚愧，有點難爲情哩，保皇黨人的自由，「好像」近於「不流血革命」的英國式的自由，其實，英國式的是王室與資產階級的妥協，和平轉變爲資產階級的近代君主立憲國家；保皇黨的却是：「保大清」封建統治，變法維新，君主立憲，對資產階級「御賜」一部份自由，取消資產階級的革命，排斥「革命黨」，如果，把二者「好像」起來，給英國人聽到了！要笑歪嘴巴的。

而且，英國，由於封建王室的妥協，資產階級不需要聯合工農羣衆暴力革命，所以英國式的自由，工農人民羣衆是沒有份的。法國則不然，資產階級和工農羣衆，曾經團結強有力的統一戰線，打垮了封建反動，完成革命，雖然，後來，統一分裂了，自由果實爲資產階級所獨得；但，法國式的自由，不能不是革命式的。中國近代革命，處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革命對象是三重的，反封建的，反官僚資本，還要反帝國主義；所以，必需動員廣大的工農人民羣衆，結成統一聯合戰線，合力奮鬥；所以，中國的自由不僅不同於英國式的，還是法國式的，而且還比法國式的更要深刻，中山先生早在同盟會時期就提出「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號召人民大眾爭取土地的自由，英國沒有過，法國也沒有過，中國的這份自由，比英國式的進步，比法國式的也進步。

「自由」一辭，雖是近代外來語；但，自由的根由，却是中國社會所自生，英國有英國

式的自由，法國有法國式的自由，中國有中國自己所特有的自由。中國有中國式的自由，我們不要忘自菲薄，我們子孫應當貴祖宗這一份自創的光榮的自由。

二關於自由一辭的正確理解

前面說過，「自由」這個名辭，把他離開社會政治時代諸條件，孤零零的作抽象的一般的解釋，就沒有意義了。這裏，對自由這個名辭，還得要作做個明確的理解才是。首先，自由具有具體的內容才有意義。舉個例來說，所謂「思想自由」，一個人不開口說話，不用筆作文，悶在腦子裏胡思亂想，像白天做夢似的，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這又什麼叫做自由不自由呢？可是，當你把所想的寫成文字，說成話，就會受到身子以外的干涉，那時候，所謂思想自由不自由的問題，才發生出來。「自由」一辭的提出，就有其意義。所以，「自由」，根本上不能是個空洞抽象的名辭，而是非常實際的具體的社會意義的名辭。

自由，低義說是各個人的生存權利；高義說，是各個人的個性表現。人，是社會的人，人，要生存，要表現個性，必得在某種社會裏。離開了社會，個人既無法生存，還談什麼個性不個性。基本上，人的生活是社會性的，個性也是社會性的，所以自由當然是社會性的。一個人，在一個合理公平的社會裏生活，個性可以極度發揮，生存得幸福快樂；反之，在一個不合理不公平的社會裏生活，不但個性不能發揮，生命也常常遭受威脅。實在說，各

個人的生命要有充分安全，個性要能充分發揮，非有合理公平的社會不可。幾千年來，多少人就爲着這個合理公平的自王國追奔的呵！現時代的舊社會，不合理不公平到極點，每個火靈息在殘暴罪惡的氣氛中，被奴役，被虐待，失去康健，泯滅了人性，還談什麼個性表現，可是，當人們的個性自覺了，就會挺身起來，反壓抑，反迫害，以「叛逆者」的罪愆，執行社會革命。法國革命的三大口號，就是「自由，平等，博愛，法國人民，爲自由而戰，爲自由而犧牲，「不自由，毋寧死」！人類社會的歷史，真就是一部人類爭自由的歷史。

提起自由一辭，就該緊繫着社會關係的理解。

其次，卽如前文所說，自由有法國式的，英國式的以及中國式的幾種。由於英法中三國社會條件時代社會力量對比與政治形勢不同，所以，三國的自由內容也就不同。法國的資產階級，爲要擊退封建的專制獨斷，高唱「平等」，與「自由」；聯合工農人民羣衆一致奮鬥，艱苦莊嚴，流血革命。英國式的自由，祇是資產階級的，與人民無關，是妥協和平改良的。中國式的，比法國式的，還要艱苦，還要莊嚴，反封建，同時要反帝國主義，自由的內容，不僅是英法的貿易自由，土地自由，還有民族的自由要求。因此，資產階級與人民羣衆聯合的革命主張，自由內容，要相結合，不能可此可彼，「徹底民主主義」的。

又如，有些人，提起自由，就着在思想自由上，說人類的解放基本於思想自由，所以，

竭力呼籲爭取思想自由之重要，此外，經濟自由政治自由等，則被忽視。這種說法，英國魯賓遜著的一本「自由思想史」可爲代表。顯然，這種說法，未免空洞，但，這真是舊時代一般思想家對自由的素樸朦朧的理解。雖然如此，仍不失其進步的意義。近來，一派入，則認爲人類社會的實現真正的自由，必須社會經濟發達，廣大人民羣衆掌握社會經濟生產機構，發動社會革命，打垮祇有少數人經濟自由的資本制社會，實現「大多數人」乃至「全民」經濟生活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在這新社會裏，人們應有的其他一切自由，就逐次獲得。自由必然達到自由的王國。中山先生就曾舉其身以「公天下」「大同世界」爲倡導的，就憑這份自由的偉大理想和進步的內容，中山先生獲致了「遠東偉大的人民的導師」的贊譽，豈是掩辭？

再次，自由的內容，不是呆板不變，一次規定的。他是社會歷史的產物，牠隨着社會歷史的發展而前進，而前進，改變其內容的。夏康農先生說，自由，「這個觀念，也是隨歷史的發展，逐漸由素樸朦朧的理解進而成爲科學性地明確的。」（註四）爲什麼呢？

首先，如前所說，自由，是一種生活的要求。要求什麼呢？要求起碼的生存權利，和高義的個性的充分表現。如果有人受壓迫受剝削，勞而不得食，飢寒交迫，無以爲生，他們要求活下去，就必須向壓迫者剝削者要求「生存權利」。「農民們要求「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自由，商人們要求貿易的自由，反對苛重的田租，反對苛雜的捐稅，農民暴動，商人罷市，

乃至於工人罷工等，是爲生存權利而鬥爭，即是爲經濟自由而鬥爭。就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全民族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剝削，陷全民族（大資產階級買辦漢奸份子除外）於困苦的時候，民族的反帝國主義壓迫的解放運動，就必爆發起來，爲爭民族的生存權利而鬥爭，即是爲民族的自由而鬥爭。一個專制獨斷的法西斯的軍閥式的政府，爲要維持其少數人的剝削與統治，不勞而食的優越的特權與地位，怕人民反抗，怕人民革命，他們就不許人民有任何的言論、集會、結社等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而人民羣衆是人，具有人性的人，就不甘願被迫害而死，剝削而死，起而抗爭，用言論來暴露統治者的醜惡面貌，來號召激發羣衆的同情和覺醒，最後，用政治行動來動員鬥爭，爭取人民應有的經濟政治思想的自由，概言之，所謂民主自由，即人民的自由。

至於那些統治者剝削者們，他們高高在上，不勞而食，想吃就吃，想穿就穿，心緒不耐煩，要罵就罵，打就打，甚至像前面所說的關麟徵要殺人，有他「開槍的自由」，誰有總管他？想到就做，意志就是法令，他們懂得什麼叫自由不自由？夏康農先生說過如下的幾句關於自由的話：「愈是站在支配者的上層，他們的這個感覺愈淡漠，要有所感，就就心受壓迫者的反抗，再不然就是害怕他也要衰老，要死亡，恨不得求到不死之藥，永遠維持着他那美滿的生活。事實上，祇有那各時代中永遠是那經濟生活最受壓迫的勞苦人民，纔成了爭取自

由與推動進步的真正骨幹。」。(註五)

明白了這點，那末，可以想像到，歷史上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勞苦人民的社會地位，生活方式也不同；因此，他們的感覺也不同，從而他們對生活要求的內容，即自由的內容也不同。

在古代古奴隸制社會中，奴隸的生命、人格、身體，都爲主人所有，像牛馬一樣，被人所有，沒有任何的自由，他們雖然在極度的強制勞動中疲怠得不容一刻間暇的思想，失去健康，人性被毀滅，成爲「歷史上最不覺悟的人。」但終也覺悟了，怠工、逃亡，暴動起來，要求取回人身自由，要求歸到原始自然的最低度的經濟生活的自由，僅此而已。

到中世封建制社會中，農奴佃農們在超經濟的佃耕制壓迫下，雖比奴隸稍稍解放，有自己家屋，妻女私經濟了；可是勞作終年，衣食無着，無以爲生，他們要求「分地」，要求土地的自由，但糶糶浮淺，沒有明確的方向，祇是直覺的反射性的。所以，不斷的暴動，雖然打垮地主統治政府，但繼之而來的不是農民自己的新政權，仍然是地主政府，政治自由與思想自由尤其矇矓。

封建社會末期，工商業發達，新興資產階級興起，要求發展工商業的權利，要求貿易的自由，反封建專制獨斷，他們的經濟自由要求強烈，而且科學文明進步，對自由的理解，具

證而明確，所以政治自由從而思想自由的要求也真體明確。而且，不像奴隸農民的認識那樣朦朧素樸，他們對反封建鬥爭的力量與形勢，也估計到，把貿易自由和土地自由的要求，結合起來，和農民羣衆結成聯合戰線，一致反封建，爭自由，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再到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社會，是資產階級的，雖然農民羣衆曾經參加他們的反封建戰爭，但農民生活在封建農村自然經濟生活方式中，自覺性是不夠的，被資產階級遺落了，出賣了；因此土地自由的要求繼續存在。到資本主義社會末期——帝國主義階段，資本集中，生產集中，工業生產的勞動羣衆工人，新興起來，他們千萬人集合在一起，生活，生產社會化，佔有仍然私人的；再加資本競爭，生產過剩，工人生活惡劣，要求改善生活，改善工作條件，而罷工、而暴動、而革命，提出了社會主義，全民總解放的口號。於是，工農聯合起來，一致爲土地自由社會自由而鬥爭，打垮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徹底的民主主義的全民的社會主義社會，全人類獲得總解放，全人類獲得充分的自由，躋入處於自由王國，天下一家。

在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如前所說的我們的中國，他有帝國主義的官僚資本與封建的三重壓迫，中國人民生活的要求：就有反帝的民族的自由和反封建的土地的自由，因爲大資產階級背叛中國革命，和封建的專制獨斷勾結號召尊孔讀經，當帝國主義經濟的政治的文化乃至思想的買辦，因此，中國革命陣營，就成爲中小資產階級和廣大勞苦工農人民

羣衆的聯合，而以人民羣衆爲主力，所以，今日中國，爭土地的自由和爭民族的自由，不僅並重，而且，前者成爲要求的重點。因爲這個重點，決定着中國的自由，不約束於資產階級的範疇，而可促使之正步邁進到人民的時代，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達成中山先生所致力追求的自由王國，大同世界的偉大理想。

由此可知，自由的內容，是變動着向前進步着的。所以，自由的原則和條件也是變動着進步着的，也就是說，自由主義是變動進步着，各式各樣的；又所以，自由主義對自由的要求也是變動着，向前進步着的。

最後，要求自由的人，總是大多數的，自由，究極地說是大多數人的。

如前所說，要求自由，愛好自由，不惜流血犧牲以求自由，成爲『爭取自由與推進進步的真正骨幹』的，『永遠是那經濟生活最受壓迫的勞苦人民』。而這些人民在各時代各社會，終是佔絕對大多數的。古代奴隸制社會中，被壓迫的奴隸人數，就雅典一地說，十九個人中，祇有一個人有自由，十八個是沒有自由的奴隸。有人說：自由民與奴隸是一與十八之比（註五）封建制社會中之地主與農民的數量，拿中國明代的來說：顧炎武日知錄上說：『吳中之民，有田者十一，僞人佃作者十九。』，也是一比九。現在的中國，農民羣衆，就佔有百分八十以上，再加上工人，則地主資本家、商人等，佔不到百分之十，封建近代，兩個社

會中，勞苦人民佔絕對大多數，是毫無問題的。他們被少數人剝奪了自由，使得他們經濟生活惡化，無以爲生？不得不起而反抗，爲爭取自由而戰，甚至於犧牲。

而且，封建社會中，工商是「末利」，工商業者，是當作「賤民」看待的，沒有政治地位，中國傳統着重農抑商政策，商人是「庶民」之一，也是被壓迫者，他們也要求自由！尤其是封建社會末期，新興資產階級要求發展工商業，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權，和工農羣衆站在一起，反封建，爭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中，大魚吃小魚的資本兼併過程中，中小資本家經濟環境的惡劣，憤慨大資本的壟斷獨佔，某種情形下，也參加工農羣衆反資本爭自由的革命運動。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經濟環境惡劣高分，日趨沒落，他們和工農人民羣衆聯合起來，反帝反封建大資產階級專門買辦，爭取自由。

所以，勞苦人民羣衆固然是爭取自由的真正骨幹，是絕對大多數，再加上被壓迫民族的和階層的，參加人民羣衆的自由戰線的，也爲數不少。

自由，是一切被壓迫者們所深切期望和熱愛的，而被壓迫者在過去的階級社會中，他終是絕對大多數的。自由，基本上是「大多數人」的。所以，自由主義必須是爭取「大多數人」的自由的。

以上四點的承認，對自由的正確理解，是必須的，也是最根本的，不然的話，自由就會落空到前文所說的「打人的自由」，「開槍的自由」，那類令人啼笑不得的荒謬解釋的。

(註一) 胡繩：論自由主義在中國

(註二) 同上

(註三) 夏康農：自由，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者

(註四) 同上

(註五) 同上

第一章 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者的理解

一 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者

前面說過，自由是每個人生活的基本要求，人人要生活，人人要自由。當然，統治者壓迫者雖然口頭上文字上，也玩弄「自由」二字，甚至列入國家大憲大法，其實，他們自身就沒有什麼自由不自由的感觉，壓根兒就不懂什麼叫做自由不自由。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那些「打人的自由」「開槍的自由」。祇有受壓迫者，纔真正懂得自由的意義。

可是受壓迫者的社會環境，常是變動着和多方面的，因此，他們所感覺到的自由的要求，也就深淺不一。從而，他們關於自由要求的一套說法或原則，即自由主義，也就不相一致，又從而相信和實踐這種自由主義的人——自由主義者，自然，就五花八門，各式各樣。從自由，而自由主義，再而刊自由主義者的關係，是一個整套，不可分割的。

例如：自由，前面我舉出有法國式的英國式的和中國式的幾種；所以，自由主義和自由

主義者也有法國式的英國式的中國式的幾種。

先說法國式的。前面不是說過的嗎？法國革命是自下而上，資產階級和農民羣衆聯盟反對封建，流血革命鬥爭的。法國人民，一致爲自由而戰，爲自由而犧牲，戰鬥三十年間，悲壯嚴肅艱苦卓絕，鐵血爆發自由花，頭顱鑄成平等果，提起法國大革命，誰不驚心動魄。

法國的自由主義，可說是爲「大多數人」謀求自由的，所謂「民」主自由，這「民」，是確指着資產階級和廣大農民羣衆的。而且，同時倡導「平等」，「博愛」二大口號。自由不是某一階級的，而是「平等」的，並且是博愛的。這一份進步的自由主義，至今令人回憶，「近代法國的光榮！」而盧梭馬柏利和貢多塞等偉大的自由主義者，血寫了有名的「人類歷史文獻『人權宣言』」，特別是盧梭，至今被人敬崇，尊稱之謂「法國革命的精神之父」！

夏康農先生有一段論法國自由主義的話：

「近代意義的自由呼聲，其實是先由法國革命所喊出的。那口號聯帶着另一個觀念，構成自由呼聲的重要條件，就是「平等」。從思想文化的意義上說，這本是笛卡兒理性主義的發展，成爲法國革命時前後白種人世界的思想主流。作爲法國革命的精神之父的盧梭，他是要求人權經濟權的一切平等，認爲社會是一種契約的結合，無所謂神權王權的。這契約裏面就應當載着自由的條件，後來再經過了馬柏利（Mably）貢多塞

(Ourgained)們思想的補充，就成了「七八九九年人類歷史文獻「人權宣言」的基本內容。當時理性主義是要締造一處理性與正義的王國，這裏面有空論的演繹，也有具體的社會內容，雖然從現在看起來，那祇是資產階級聯合人民的革命主張，但是當時要退封建制度內任務非常艱苦與莊嚴，因之也不包含有可此可彼的自由主義。」（註一）

得特別注意的，法國當年的「理性」與「正義」，乃至於「人權宣言」，雖不免於「空論」，但「也有具體的內容」，最重要的是「不含有可此可彼」的餘地，只容許前進，只有前進。這種艱苦莊嚴進步，是法國自由主義不滅的精神，

英國式的自由，是封建王室與資產階級妥協，用自上而下，憲政運動，「不流血革命」獲得一份的資產階級做生意的「貿易自由」。關於這點，夏康農先生說：

『是法國革命的巨浪沖激到了產業先進的英國，震撼了那裏由王室與資產階級妥協安頓了下來的一份所謂「不流血革命」的社會，這總有了對於英國思想半迎半拒的一種思想或者不妨稱之為自由主義。例如愛德蒙·柏爾克(Edmund Burke)他一方面譏諷盧梭的著作是「濫寫人權的廢紙」，另一方面却又是向喬治三世鬥爭人民自由權利的重要辯護士。他一方面否認社會契約說，嚴然假定社會秩序是盡人事以聽天命(他好用「天命」(Divine Providence 這個名辭)，另一方面却又相信殖民地「人民」(其實就

是殖民地開始者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勝利，對於英國的自由權之維持，是非常重要的。又如，普雷斯特利 (Joseph Priestly) 稍進一步，說人類是生來平等的，享有平等的是又還要控制着這個鼓舞以便向王室爭取自由，這纔也滿口都是人民的主權。尤其有趣的，是他們認為「人民」最重要的自由權利就是「貿易自由」Free trade，更是畫龍點睛，道着了這自由主義的精髓。」(註二)

英國的這種「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者」如柏爾克和普雷斯特利，他們否認社會契約說，批判人權宣言，直認人類「生來平等」，「享有平等自然權」，相信「人人」的勝利，以及標榜個人自由等，這些不能說不是進步的一面，雖然他們所說的「人民」僅僅是「新起參於政權的資產階級」，農民羣衆不在其內，較之封建的專制獨斷，是有其進步性的。而其控制「人民的鼓舞」，做「向喬治三世鬥爭人民自由權利的重要辯護士」；把社會秩序當作「盡人事以聽天命」的看法，這種溫和妥協，那有法國革命精神的一點兒氣息？完全是市儈「貿易自由」的作風，這却是反動性的一面。特別是濫用「人民」一語，至今還是邱吉爾等口頭引用的無厭濶言的藍本。

不僅如此，英國是一個先進的產業國家，遍地都有英國旗，到處是他的殖民地。他的強大，「光榮的帝國」，就是建立在國內工農勞苦人民羣和落後的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上的。所

以，英國式的一份自由，在初是個人主義的「貿易自由」；在後，便成爲帝國主義的「貿易自由」。例如，對於我們中國，誰也不會忘記中英鴉片戰爭南京條約的恥辱！什麼「改善」通商貿易條件？還不是海盜行爲的暴力征服與掠奪。百年來，就是一個專門犧牲弱小以肥私利己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兩次分割殖民地的世界大戰，人類大屠殺，英帝國主義的自由，不能不負責。夏康農先生說得好：

「直到這一次的大戰爲止，英國由於佔了產業革命的先着，在近代歷史上一直是犧牲了產業落後的國家的自由去培養他自己的自由主義的。中國人儘管再佩服英國的自由主義，但是一想到他們來敲破古老中國的大門，是憑着鴉片煙販子身份幹出來的這一件事，總有點替這一份自由主義難爲情，他們是一直都並不尊重我們的自由，總想利用中國的落後找點便宜的。」（註三）

夏先生還接着論到美國的自由主義：

「今天的美國更不必說，他們的壟斷資本家，憑藉本有的經濟優勢，又發了一大票戰爭的橫財，一心只想購買我們廣大人口的血液，遠親近他們的政府絲毫都不放在眼裏，任何人都可以拿中國人和中國政府罵得狗血噴頭，暗地裏却仍然在無孔不入地進行他們的凶狠勾當。假使要說這也是自由主義的表現，那麼，這一份自由主義該是墮落成

多麼醜惡的一副面孔」。(註四)

話說回來，當年英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當其用資本主義的洋槍大炮印花洋布科學文明去突擊那些產業落後國家的落後性，使之「開化」「進步」，成爲適應其消費貨物的殖民地市場，這，一面自有其進步性，但另一面專以先進產業國家的機器生產品去榨取落後國家的民脂民膏，並且用暴力去征服人家，強使之爲殖民地市場；顯出了他的反動性。

還有，他在本國，曾經突擊過束縛勞動力阻礙工商業發達的封建諸關係，表現其進步的一面，可是，對於落後的殖民地國家的封建關係又如何呢？拿對中國來說：他呀！爲要強制中國永遠做他的商品市場，做他的單純原料生產者，就得使中國「永遠停滯」爲「以農立國」的農業國，壓制中國資本主義自發的經濟的政治的前途。因此，他就勾結中國封建勢力，一面使之成爲牽制中國工業現代化的工具，一面使之成爲最好的買辦與走狗。所以，太平天國進行反滿清封建統治的革命時，英帝國主義的洋槍大炮，戈登將軍的長勝軍，就幫助滿清封建勢力，結成聯盟，消滅革命，支持勾結封建勢力是反動，阻礙落後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反動。根本上，以殖民地落後國家的人民的血淚，培養自己的產業，一句話，犧牲產業落後國家的自由，培養自己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是資本帝國主義反動的自由主義。

法國革命後，產業革命與政治革命的自由鑿鑿，不僅敲醒了不少沉睡於專制獨斷下的人

民，而且，在英國式的「人民」的自由，本來是新興的參與政權的資產階級，廣大的人民羣衆是不在內的，即是說，所謂「人民」自由與真正的人民是無份的。自然，這些人民如果覺醒起來向資產階級爭取自由的話，那就危險了。同時，又如果殖民地人民也覺醒起來，向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自由的話，更麻煩。所以，像法國式的自由甚或英國式的像柏爾克和普雷斯特利那樣具有進步性的自由主義，也太具體太實際，蘊含着莫大的危機。所以，最好是把自由作理性主義、哲學思想、人生態度的一些抽象懸空，不着邊際的解釋，自由的觀念玄妙了，原則化了，解釋起來，大大方方，活像開明紳士的氣派，這樣把人民的自由要求，從社會經濟物質生活的要求方面轉移到抽象思的觀念的意識的爭辯，避免了現實問題，這樣的爭取自由，以其說是爭自由，毋寧說是取消自由，英國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就是這樣情景下產生的一位專事抽象自由玄化自由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有名的「論自由」(On Liberty)一書，至今被醉心英國自由的紳士自由主義者們所崇奉，視同聖經，不可移易。「論自由」的重要理論，原則如何呢？據夏康農先生歸納起來，有如下的六點。

- 一、任何思想決不會完全無可批評；
- 二、凡是正當的思想是不怕批評的；
- 三、自由思想的要義是寬容不同的思想；

四、誰都無絕對標準以禁止旁人的言論與思想；

五、只有以思想糾正思想，而不應當用威力干涉；

六、任何思想必須有反對思想以相砥礪，纔不敢流於腐朽。

我們一看這六點抽象的原則，是多麼大方，多麼公正，難怪，今日中國許多自由主義的論文上，還寫滿着自由主義「不怕批評」，「寬容不同的思想」，自由主義「必須有反對思想以相砥礪」等一大套堂哉皇哉的話句哩。其實呢？全是一個玄妙，廢人的一套咒語而已。還是引夏先生的話來批評牠罷。

「這些抽象的原則，一看就儼如面對着英國型的開明紳士，他們已經上台執政，一方面頭上還保留着一個王朝，自然也還留下些不合時宜的封建臭架子，一方面又騎在人民的頭上，總得「開導」他們遇事不必心急，世間本無絕對的是非，依違於左右之間，有話大家好好商量，雅量誠然可敬，但多少總含有點阿Q癡着給肥王爺子的時候，口叫「君子動口不動手」的那麼一種意味，這裏面是決不肯承認人間有客觀真理的。——說到頭來，這仍然是中間階層的思想基調，「飽人不知餓人飢」，厭惡着「鬥爭」那一套的」。(註五)

像上述英國紳士型的「自由主義」，在英國那樣的社會環境裏，坐在沙發上吸着雪茄

裡，喝着咖啡茶，閉眼，神思着，給自由主義作理性，正義的，溫和漸進的，哲學說教，英國的「人民」是能接受爲之醉心的。可是在歐洲的幾個大陸國家，他們的社會環境不同，民族的階級的矛盾交錯着，社會思想趨於極端；對於不冷不熱的英國紳士型的自由主義，是不合胃口，不能饜足其精神飢渴的。他們急進，他們要「革命」，要否認一切權威的約束，從而否認政治統治的政府乃至於國家，追奔一個絕對的自由主義，大有「不受一物所羈」的烏托邦理想主義的精神，成爲無政府主義思想者。自由，在他們看來，應該是無條件的。絕對的；自由主義也是無條件的絕對的，這樣，自由就成爲更空洞更玄妙更抽象的一個理念，成爲腦子裏觀念的遊戲或情緒的瘋顛了。這樣的「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者」，把自由，自由主義的觀念論的理解，達到了極點，成爲絕對的主觀觀念論的說教，似乎，他們是最「急進」，而且是最「革命」的，「急進」「革命」得成爲可怕的恐怖主義；其實，是最反動的，甚至是最凶主義的。當年的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及其同道者們，在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高潮中，大都成爲資產階級反動政府的幫凶，成爲思想上政治上反民主反人民的有力盟軍呢。所以，有人說，無政府主義是取消主義，無政府主義的「自由主義」，是取消主義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而成爲取消主義，「自由主義」就被取消了，取消了，就沒有了，還談什麼「自由」，「自由主義」，一堆空話。當年在西方，流行着「種名言，雖只

短短的幾句，確給無政府主義着的醜相，完全描繪出來了。錄在下面，以資欣賞：

『本黨有黨綱兩條：第一條，本黨並無黨綱；第二條，本條取消第一條』。

此外，在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如中國，許多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主義，由於社會環境政治條件關係之不同，也就和上述的各種自由主義有所異殊。例如康有爲。他是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滿清時代。當時，各國革命變法維新成功，近代國家，紛紛建樹。而滿清政府的封建統治腐敗到極點，岌岌不可終日，康有爲於是號召全國士大夫知識份子上書皇帝，請願變法，倡導君主立憲，普及教育，振興工商業，甚且倡導「去國界合大地」，「去種界同人類」，取消國家，取消民族，全人類天下「大同」，這種無國家無民族的自由主義，不類似着西歐無政府主義的自由主義嗎？而且，他還主張「去級界平民族」，「去產界公生業」取消貧富階級，全民族一體平等，取消私有財產，大家共同生產，這又跡近烏托邦共產主義了。此外還倡什麼「去類界愛眾生」，「去亂界治太平」，「去苦界至極樂」。總稱之曰「大同之治」。其實，這都是觀念論的絕對「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一樣，變法不成，就變了自己，變成爲滿清封建皇朝的反動統治的幫凶，在日本大唱其「保國會」「保皇黨」，保滿清政府的統治，保光緒皇帝的復辟；而和中山先生領導爭自由的同盟會革命黨鬥爭，成爲革命的敵人。

康有爲的這種「自由主義」，顯然，在封建滿清統治和新興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帝國主義支配下，封建士大夫階層，維持封建統治，取消革命的一種企圖。

二 自由主義的範疇與派別

由於時代條件社會條件政治形勢以及政府的階級性等等的複雜多端，自由，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者，也就五花八門，各式各樣。

那末，究竟什麼樣的自由，才是真自由呢！前面不是說過嗎，祇有被壓迫的勞苦人民羣衆，他們纔真正懂得自由，祇有他們提出的自由的原則，纔是真實的，也祇有他們纔會真正確信這些原則，並爲自由而戰，爲自由而犧牲，實現真正的人類自由。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機器生產，資本集中，勞動力集中，生產社會化了，勞苦工農人民羣衆覺醒起來了；而生產物和資本的佔有，仍然是少數私人的，這種私人的佔有和生產的社會化，矛盾不可開交，因此，不斷地爆發工人罷工，社會暴動；一些人希望把私人的佔有，改變爲社會的佔有，和生產的社會合致起來，解放生產力，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樣，聖西門傳立葉等的社會主義思想就適應着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的急化而顯現起來，成爲時代思潮，不可制阻的洪濤。但是，這種解放全社會的自由要求，要使之成爲現實，就非得號召組織動員。

全體勞苦工農人民羣衆起來戰鬥，執行社會革命不可，否則，強大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是不易摧毀的。

就這樣，自由，由抽象的，空洞的，玄妙的，變爲具體的實在的明白的；由溫和的漸進的轉變爲急進的革命的；由虛無的浪漫的，變爲嚴肅的認真的；一句話，由非科學的轉變爲科學的。

自由，成爲科學性的思想時，他就成爲今後人類爭取自由的精神武器。自由，當其成爲這樣的科學思想時，他就不叫做自由主義了。

(註一至五) 夏著，見前章。

第三章 自由思潮的歷史發展

一 自由思潮在西洋

嚴格地說，自由主義這名詞是站不牢的。歷史上其實只有自由思潮，而沒有自由主義。遠在古代希臘奴隸制王國中，由於國王奴隸主的荒淫暴虐，暗無天日，不少人，被這虐政刺激出個性的自覺，以叛逆者的姿態出來抗爭了。喜庇亞認為希臘那蠻奴役人性的法律，是摧殘人性的壞東西，高呼：『法律是人類的暴君』的話。勃洛大哥洛說：『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也奮起倡導自由，主張尊重個性，反對專制獨斷，終於被捕遭殺，成爲自由的殉道者。亞里士多德，是希臘自由思想的策大成者，他更進一步的提出人民全體有主權，人民全體管政治，『人類是政治的動物』說，強調民主自由，更號召人民全體爲民主自由作政治的鬥爭。我們知道，其後有名的梭倫的改革，正式開始了希臘第一次的自由運動。雖然，運動的果碩，被財閥們劫取了，終於接着掀起第二次自由運動，完成了克利爾尼的改

革，雅典的民主政治，真正實現了，又雖然，仍是狹隘的，與奴隸羣衆無關。

歐洲的中世紀整個社會的思想和信仰，全被封建貴族的基督教及其神學所蒙罩，自由民主，得不到一點發揮的機會。專制獨斷，迫害屠殺，把一些自由思想者也摧滅殆盡。我們知道，哥白尼的「天體的旋轉」一書，威克里夫駁斥「變體」之說，薩佛羅拉反對教會濫用職權，主張思想自由，一一被教會燒殺屠戮。法國南部的一個宗派——阿爾俾派，因反對服從教條，全部爲羅馬十字軍屠殺。

到封建末期，資產階級興起，他們工商業地位強大起來，經濟的從而政治的自由，要求強烈，因此：自由思潮就高潮起來，波濤澎湃，向基督教神學思想猛撲，繼承古希臘自由思潮的優良傳統，力求人性的解放，號召「發現人」，倡人文主義，這，就是文藝復興。同時，哥白尼等的鬥爭犧牲，阿爾俾派的血流，沖刷了基督教的思想統治，爲馬丁路德的自由思想宗教改革，開闢了大道。其後，資產階級勢力成熟，反封建的民主洪濤——法國大革命，就接着爆發出來。

十八九世紀的自由思潮，表現在經濟與政治的兩個方面。由於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繁榮與發展，以英國亞當斯密爲代表，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的經濟思想，就高潮起來，激盪着全歐洲；同時，以洛克盧梭爲代表，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政治思想，也泛濫起

來。經濟的，政治的思想主流，在於自由，換言之，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的思想主流，在於向封建統治爭取自由，英國，老早就有限制國王權力，要求人民的自由的思想。一二一五年有大憲章運動，一六二八年有權利宣言書及一六八八年的權利宣言。美國法國革命時代，自由精神便具體規定之於憲章中，如一七七六年，美國十三洲獨立宣言中，明白宣示人類平等的原則，及『生存，自由與尋求幸福』的權利。一八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會議中通過人權宣言，宣布『人們生來並且永遠是自由的和權利平等的』。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對於壓迫的反抗』。

不論亞當斯密洛克盧梭，這些資本主義初期，即自由競爭時期的自由思潮，其實都是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雖然是個人主義的，但當一個個性自覺，發揮起強烈的革命與戰鬥時，自由思想的洪濤，却是可以衝毀封建等制獨斷主義的。英法美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就是在盧梭等「不自由毋寧死」的號召下，戰鬥成立的。

原來所謂資產階級或市民，在封建末期，他們是受壓迫的沒有經濟政治自由日中間層，他介乎地主教士和農奴之間。在經濟上，市民從事自由企業，當然贊成自由競爭。所以，法國革命時就高唱自由，後來的英美諸國，也一樣，自由思潮風盛一時，是各國一致的現象。當時，資產階級爲要推翻封建統治，高唱自由，平等，還有博愛，把工農羣衆也號召起來。

一致動員，結成革命聯盟的統一戰線，進行流血的革命戰爭，三十年的法國大革命，確實表現了法國資產階級當年的英雄領導堅毅的精神，是革命的，進步的。可是，當革命成功，政權便落到市民手裏，成爲統治者了，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便開始變質了，變成爲與工農羣衆無關的了。就是英國罷，王室對資產階級妥協，君主立憲，「不流血的革命」，完成了近代國家的建立，從頭起，近代英國的自由主義就與工農羣衆無關的！

尤其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時代，發展到壟斷獨佔的寡頭金融資本家的獨占時期，對內，生產的社會化和私人的占有制，矛盾到極點，國內工農無產階級的自由要求，強烈萬分；國外，殖民地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也高漲起來，這樣，他們爲要鎮壓工農羣衆和殖民地的社會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就採取暴力統治政策，集中力量，施行專制獨斷，而且有許多國家，還和封建勢力勾結起來，加強專制獨斷，把以前曾經允許的選舉權，罷工權，完全取消了；連一般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等自由，也成了紙上空談了，澈底反人民反自由，成爲金融財閥大資本家的新的專制獨斷主義——法西斯主義。

尼采，我們知道，他是個極端的暴力主義個人主義者。他主張絕對意志的自由論，說：如果意志不能滿足，便有痛苦，要去痛苦，便要奮鬥，無止境地奮鬥，學達爾文的：『生物競爭，適者生存』，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精神去奮鬥！他說爲滿足「一己之欲」，什麼正義

但愛，最高之善，都是廢話，戰爭，屠殺，那才是有效手段。並且他還說：「人民是大炮的糧草」，「人民是英雄的陪襯」，「屠殺人民，就像撲殺蒼蠅蚊子一樣，不值得憐惜」，而人生的真諦，就在於那「像老鷹翱翔天空，直撲地下攫小鷄時的瞬間刹那發現」，這個老鷹的絕望的自由主義，不就是後來德國法西斯魔王希特勒的經典麼？

不僅希特勒，就是今日的杜魯門，也在高唱自由主義呢！他還號召中國的自由份子主政，健強政治，特別是受過美國教育的自由份子，似乎，美國還是自由主義的祖師呢。

二 自由思潮在中國

西洋民主自由思想之傳入中國，是鴉片戰爭以後，主要的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和陳天華，孫中山的兩大派。前者是貴族官僚士大夫，維護封建皇朝維持封建統治的，後者是市民農聯合陣線反封建統治的。

然而，就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情形說，康有變法也還有其進步的一面的。因為當時以慈禧為首的封建統治集團不僅對內剝奪了廣大的勞動人民的一切生存自由，並且腐敗到成爲新舊的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的嚴重桎梏，同時還要「寧贈友邦，不與家奴」，澈頭澈尾地把民族國家的主權利益變手獻給了帝國主義，這使一部分素來自尊自大貴族官僚士大夫以及開明的

士紳階級也感到不可忍受。這就是說，慈禧反動派的專制農國的統治不僅損害了新興民族資產階級並且由于澈底投降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勢力長驅直入，也損害了一部分封建勢力。康梁便是主要地代表了一部分貴族官僚士大夫，一面圖自強以抗拒帝國主義，一面却以維新來維持封建皇朝，阻止新興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前進。他們只要向慈禧反動派爭取自由，這是進步的一面；但又阻止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爭取更多更大的自由，這是反動的一面。所以當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皇朝，康有爲便變成澈底反動的保皇黨了。與維新保皇黨走着不同道路便是以孫中山爲首的革命黨派；這是代表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與智識份子的。這一派在爭取民主自由的立場上看，無疑地，比康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可是歷史證明着，辛亥革命的時代已經是帝國主義時代了；僅僅承襲西洋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思想，僅僅進行種族革命，而不堅決反帝，僅僅提出「平均地權」的空洞口號而不堅決實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僅僅依靠孱弱的民族資產階級與智識份子而不依靠廣大的勞苦人民大眾，是不會成功的。因此辛亥革命的失敗證明了西洋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思想是不僅不適合實際需要，而且大大地阻礙革命事業的發展的。歷史再度證明，五四運動時代所提出的民主與科學，反帝與反封建的口號早已越過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而向社會主義思想的領域邁進了。事實上，歷史的飛速的發展已經否定了西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的民主自由的思想，所謂「自由主義」已經失去

第四章 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

一 應有的基本精神

假使世間還有自由主義，而且的確還能、受自由思潮的傳統精神的話，那麼，至少也得具備下列各點。

第一。自由：望文生義，自由主義者是追求自由愛好自由的，毫無疑問。正因不自由，所以要求自由，成爲自由主義者的。根本上，自由主義之誕生，是以反專制獨斷，反壓迫剝削的戰鬥姿態出現的。反專制獨斷，反壓迫剝削，是自由主義的最基本的精神。一天獲不到自由，一天不停止其戰鬥，「不自由，毋寧死」，自由，是自由主義者的第一生命。

哥白尼、威克畢夫、薩佛那羅拉，爲自由而死。歷史上多少仁人志士，爲自由而歌，爲自由而戰，悲壯激烈，其「氣撼天地，泣鬼神，中國近百年中，「自由魂」的作者陳天華，跳海殉難；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碧血，是不能遺忘的。

第二是「最大多數的最大福利」的信念。前面講過，自由，是一切受壓迫者所一致追求的，而受壓迫者，不論古代、中世、近代是「最大多數的」，特別是被壓迫的階級，如古代的奴隸，中世的農奴，近代的工農勞苦大眾，是絕對「最大多數的」，所以，自由，基本上是大多數人的，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除了爭取自己的自由外，同時是以爭取最大多數人的自由爲目標的。所以，在封建社會中，他們站在新興資產階級，城市平民及農民一邊，向封建的統治階級要自由，如法國革命時代的自由主義，就是資產階級和農民聯合戰線，一致反封建爭自由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他們便站在工農小資產階級的一邊，向統治者資產階級要自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像在中國，陳天華中山先生就是主張走「羣衆階級」，爲號召資產階級農民羣衆，向帝國主義和封建滿清統治者要自由的。現時的中國，他們便站在工農人民大眾與中小資產階級方面，向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勾結的買辦大資產階級統治要自由的。『他決不獲得一次的自由（如同資產階級一樣，只要他們自己得到了自由便不管了）或少數人的自由爲滿足，他是不斷地在進步，爭到了某此自由之後，還要往前爭取，一直到人人獲得了自由爲止。』歐美政治學說中有所謂『以最大多數的最大福利爲依歸的政治』這一原則，就是這個意思。換句話說，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一定是一位人民大眾的民主主義者。盧梭便被後世人尊頌之爲「自由之父」，中山先生也被讀者的僞爲

「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不是偶然的。

自由主義者既然是反壓迫反專制，即反對壓迫和剝奪他們自由的專制統治階級，而又贊同被壓迫和被剝奪了自由的苦難的被壓迫階級，他有所贊同，也有所反對，二者之間，他決不應站在當中，所謂「超然」或「中間路線」；因爲「超然」，就對於所當反對的不反對，所當爭取的不爭取，至少反對不力，爭取不力；這樣一方面減少了爭取自由的力量；一方面放緩了對壓迫者的戰鬥力量，這種「超然」或「中間路線」，顯然是對壓迫者與剝削者妥協，妥協就是投降，投降就是幫凶！而且呀！這與前面「爭取大多數人的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一個自由主義者既然以「爭取大多數人自由爲目標」，那末，就得雙腳踏在被壓迫被剝削的「大多數人」一邊，致力自由的爭取，堅決反對壓迫者剝削者；如果一個自由主義者而墮落到壓迫自由的統治者一面，那他還爭什麼自由不自由？更談不到「爭取大多數人自由」的話了。賈濼齋先生說，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偏右，那他的自由主義的立場也就完了，他已經站到反對大多數人自由的一邊去了。」這話是不錯的。

所以，一個自由主義者，必須同時是一個真理的熱愛者，一個虔誠的理性主義者，他，辯是非，明黑白，重正義，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能是是而非，進步與不進步，是與非清清楚楚，不容混淆，絕不容苟且，有所謂「超然」「中間路線」，更不容妥協，妥協就

是偏右；偏右就是反動。一個企圖在進步與反動，是與非，理性與反理性，自由與反自由，人民與反人民之間，從事折中的人，那還是個什麼樣的自由主義者呢？

正義、理性；是一個真正自由主義者的最起碼，而又是最神聖的條件。

一個真誠於正義理性的自由主義者，不僅僅是口頭上說，而且要看其實際行動嚴肅到如何程度，既辯是非，明黑白，就絕對不和專制獨斷的統治者敷衍，苟且，同流合污，甚而至於連一點情感上思想上的連系，也須澈底割絕，不牽掛一絲一毫，如果像藕斷絲連那樣，戀不捨，也算不得是正義理性，當然也就算不得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胡繩先生就會特別強調這點。如下的一段話，讀之使人警惕。

「根據二三十年來一直到現在的實際情形，我們似乎可以以下一斷語，凡自稱爲自由主義者的人，如果真能算得上是個自由主義者的話，至少要堅守一個條件：「有所不爲」。「不爲」什麼？簡單地說，就是不和在這二三十年來站在統治地位的政權集團敷衍，苟且，同流合污。這三十年來，從袁世凱政權到北洋軍閥的政權，到國民黨反動集團的政權，面目雖有變易，但他們的政權的性質都沒有一點「自由」的氣息是可以斷言的。他們在文化上一概地都採取復古主義和愚民主義的政策，但他們也要利用一些自命爲和被認爲自由主義的學者們爲他們作「花瓶」。如果「自由主義」的學者竟然委身屈

際，以自己的學術研究供統治者利用，甘心犧牲真理的追求和科學的良心，那邊能算得上是自由主義麼？如果更進一步，甚至是存心標榜自由主義以抬高身價，一有機會就向統治集團要求分我一杯羹，分我一席之地，那就更不堪了。隨便舉例，像那爲孫傳芳做湊滙督辦的丁文江，像那在北洋軍閥治下喊「好人政府」，而在國民黨治下聯袂入閣的諸君子，以至張君勱等等，這許多先生一到在實際政治生活上已和統治集團混成一片的時候，恐怕連自己也羞於自稱是自由主義者吧？如果還自認爲「自由主義者」，那麼自由主義者就成爲最醜惡最卑鄙的名詞了。」（註一）

第四，自由主義的優秀傳統，除了正義理性之外，就是進步與革命精神。他，不斷地求進步，胆壯氣昂，毫不畏懼，勇敢地反對，勇敢地贊同，不保守，不妥協，邁步前進，他有理想，也有步驟。他們看得出，什麼是反對的，腐敗的，什麼是進步的新興的，在今天的中國，同樣，在今天的世界，誰是反法西斯專制獨斷的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導力量，他們知道，他們與之緊密聯盟，進行革命。

二、有所爲，有所不爲

既然，自由主義具有自由，民主，正義，理性，進步革命等基本精神，那麼一個自命爲

自由主義者的人便應該有所爲，同時也應該有所不爲，他們決不能是驕頭草，決不能做驕驪，決不能做所謂「中間派」的。

自由主義者是最正義感的，當他自己遭到封建的專制獨斷的壓迫和迫害時，他固然要爲己之自由而反專斷反迫害，同樣，當國家民族受到外來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時，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乃至文化宗教的，自由主義者是一律要堅決反對的。例如，巴黎和會中，帝國主義竊取中國山東半島利益時，「五四」反帝運動，全國動員起來；袁世凱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消息一出來，全國抵制日貨，反日反袁，民情鼎沸，不可阻止。北伐進軍濟南時，日帝國主義出兵青島，阻礙北伐，全國嘩然，五三慘案，激起來反日的狂瀾，終於完成了北伐，最近，美國帝國主義公然扶植日本，復興法西斯軍國主義，以爲後日遠東反蘇反共的主力；而日寇又將以反蘇反共爲口號，和「七七」事變一樣，進行其「征服中國」的大陸政策的宿願，爲害中國，小孩也會知道的！因此，全國文化、教育、工商界的人士，亦全面展開反美帝國主義扶日的運動；就是最近司徒雷登的一篇談話，對中國人民公然施以恫嚇，便激發起同樣抗議和反擊，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是絕對的水火，不容兩存，帝國主義的鷹爪，伸展到國家民族的面前來，就威脅着全國人民的時候，自由主義者又當如何呢？毫無疑問地，自由主義必然是反帝國主義的，前面不是說過，自由主義是「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的擁護

者，所以，自由主義者，是虔誠的愛國主義者，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自由主義者，應該是最熱誠最忠真的愛國主義者。

可是愛國主義，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更不是狹隘的排外主義，而是國際主義的。爲什麼呢？關於這點，費澗萊先生說：

『自由主義者應該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他不但應當贊助和同情別國爲爭取自由而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與人民，而且更應該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這是因爲壓迫別國人民的民族，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民也是不自由的。』（註二）

所以說：一個自由主義者應該是愛國主義者，更該是國際主義者。一個自由主義者，由愛本國民族和人民的自由，同時愛別國民族和人民的自由，愛全世界民族和人民的自由。

法國革命後，資產階級，就把當年聯盟作戰的人民大眾的民主自由劫奪了，大多數人民的民主自由在以前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下是得不到的。所以自由主義者應爲推翻資產階級民主，實現新的人民民主主義而鬥爭。

費澗萊先生也說：

『自由主義者不應當反對新民主主義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爲什麼？因爲新民主主義是比舊民主主義更好的一種政治理想和制度，在新民主主義制度之下，大多數的人民要

比在舊民主主義制度之下得到更多的民主自由，過着更好的生活，那末自由主義者有什麼理由不去贊成新民主主義呢？所以，一個自由主義者在新民主主義國家就應該是一個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擁護者；而在非新民主主義國家，他應該就是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同情者。假如他所處的一個國家內也應當實行新民主主義的，那末，他就不僅對之同情而已，他而且應該和大多數的人站在一邊，以爭取新民主主義的實現，否則他就是一個假自由主義者。』（註三）

一個自由者必然虔誠地贊助和同情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當然，一個自由主義者必然是民主主義者或新民主主義者；但，不一定就是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二者有別；但，也有其發展的必然規跡，如賀潑萊先生所說：「一個追求真理，在不斷進步的自由主義者，不但反對社會主義，而且他還有可能進一步成爲社會主義者」。（註四）

至於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關係如何呢？提起來就會想到，自由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間的距離是較到社會主義的距離爲遠，但是，共產主義乃是社會主義的最高階段！自由主義者既不反對社會主義，當然，更不反對共產主義；如果說，自由主義者，不斷地進步發展，可能成爲社會主義者，自亦可能再一步前進發展爲共產主義者。當然，一個國家，如果進步爲社會主義，最「大多數人」擁有自己的政權，執行消滅階級，廢除剝削求全人民自由解放

的鬥爭任務時，反動的僞自由主義者，必然和反動的剝削者壓迫者階級，一起當作社會主義的敵人而被殲滅，爲爭取「大多數人自由」的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爲「大多數人自由」的獲得而鼓舞，爲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鼓舞，很自然的進步成爲社會主義者，既然是社會主義者了，就不再是自由主義者。共產主義國家內，是不再有自由主義的問題的；至於非共產主義國家的自由主義者，對於共產主義國家的態度，如上所說，他應該贊助同情；如果他所處的國家內也是應該實行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那末，他就不僅予以贊助同情而已，而且應該行動實踐，促其實現；否則，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同樣，自由主義者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或執行社會主義的政團共產黨，不僅不加反對，而且予以莫大的贊助與同情的，爲什麼？費澹萊先生說：「我以爲一真自由主義者與僞自由主義者的區別，就要看他對蘇聯的態度如何而定。那些攻擊蘇聯沒有自由，把她看成了如同法西斯極權國家一樣的「自由主義者」，決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不管有意無意都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只有地主、資產階級和法西斯才會仇視蘇聯，因爲那裏已沒有了他們這一批少數人的自由，即剝削壓迫他人的自由。」（註五）

自由主義者既有所爲，當更有所不爲。第一，自由主義，根本上是反封建專制獨斷主義爲任務的，自由主義與封建主義是不兩立的。卽如康有爲爲「維持封建皇朝統治，想同滿

清皇朝僅僅要求一點極言直諫的自由而不可得，白白犧牲了六君子的性命，而法國大革命正是資產階級向封建主義要自由的革命，其代價是無數量的血。可見封建主義正是自由主義的死敵。封建主義是不容任何一絲自由主義的。

帝國主義，也是自由主義的死敵。殖民地國家的自由主義者，他們要求一己的自由，就必須求得民族的自由，要求民族的自由，他們就得向剝奪他們自由的人——帝國主義去爭取。

一個自由主義者必然是反帝國主義的。

自從馬歇爾發表過中國政治應由「自由份子來領導」的談話之後，一連接地又有司徒雷登與杜魯門指導中國自由主義份子組黨主政，所謂「進步運動」的文告，多少自命自由主義者爲之鼓舞，對於這種偽裝的把戲，胡繩先生曾予以揭責。

『如果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竟然要靠帝國主義的力量扶助，那又叫做什麼「自由主義」呢？難道自由主義又成了殖民地主義的別名了嗎？帝國主義在中國有興趣的從來只是扶助一批可供役使的聽差，而不是扶助什麼自由主義，美國在中國向來就以扶助自由主義爲標榜，但是實際上他是扶助過袁世凱，扶助過吳佩孚，又扶助着今日正在靠他爲生的這個政權。』（註六）

自由主義，特別是半殖民地中國的自由主義而和美國的帝國主義，竟可發生「扶助」的關係，這種自由主義，不是民族主義，是殖民地主義，不是愛國主義，是賣國主義，一句話，是最卑賤最無恥最下流的偽自由主義。

封建社會末期，新興資產階級抬頭，提出了自由主義，作爲初期資產階級革命期間反封建主義獨斷主義的思想武器的。後來，資本主義發展到封建獨佔的帝國主義階段，寡頭金融資本家們，運用警察、憲兵、特務……『造成比封建主義高越了一個範疇的帝國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專制主義和獨斷主義，橫暴統治，毀滅人，滅毀個人，個性。』本來，初期自由主義是個人主義的，可是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也是反專制反獨斷的，不論是封建主義的專制獨斷或是資本主義的新的法西斯的專制獨斷，都是不容有任何自由的。而且這一新反動，勢力強大，反動得凶悍，日德意諸法西斯國家，一切倡導自由民主，反專制反獨斷的作家、詩人、藝術家、哲學家、法律家……自由知識份子，差不多盡被逮捕入獄，或是關進集中營，或被暗殺，或處死刑，成爲當時被希特勒所贊譽的知識份子，就盡是些歌唱暴力，讚頌專制獨斷的法西斯暴徒們；美國的恩類綏靖工作還做到好萊塢裏去了呢！

吳澤先生曾經說過：

『資本主義的集體生產，確新生了廣大人民羣衆主義，人民被發現，羣衆要求生存

權力，要求自由，要犧牲自由了，資本主義集體生產越發達羣衆主義思想也越高漲，因而，羣衆主義越高漲，資本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專制獨斷越發越反動；從而連到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也不許容存。鬥爭教育了羣衆，也教育進步的個人主義朝向羣衆主義，歐進，舊自由主義朝向新自由主義改進，個性朝向羣性改進，充實，發展了羣衆主義，羣衆主義的自由主義就成爲戰勝新的法西斯主義的專制獨斷主義的決定力量。」（註七）自由主義從反專制獨斷起，到反完專制獨斷止，自由主義排擊一切封建的法西斯專制獨斷主義。

最後，還有，改良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也是自由主義所不能容忍的。

我們知道，民主社會主義，看來，是最漂亮的名詞，既民主又社會；想革命而又「怕」革命的某些人，看到有那末一個「不流血的革命」，和平改良，自由成長，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來。這命革，不暴動，不內戰，民主的方法來對抗一切逼迫。不破壞法律，別議會制度有信心，不經過破壞，便進入社會主義的建設階段，這種由民主主義漸進而爲社會主義，既附合於遠大的理想，又能附合「和平」「民主」的原則，所以，這個名詞，不少的人是被醉心了的，你贊譽之爲「自由的社會主義」，他崇拜之爲「進步的自由主義」。說「這是現世界罕有的現象，將予世界人士以新的鼓舞與理想——自由與麵包可以而

且必須兼得。』(註八)

其實，自由主義並不是改良主義。改良就是妥協，妥協便是投降，便是反動。歷史上多少改良主義的悲慘可憐的範例呵！夠教訓我們的了。因為，改良主義的立腳點，就是偏右的，妥協反動一面，向上浮的，而且必然反革命，反進步，反人民，結局反動失敗。改良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在某種情形下，他是反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爲什麼呢？『因爲自由主義者是不反蘇反共的，民主社會主義只有在反蘇，反共的情形下，自由主義者才不來反對民主社會主義；否則，自由主義者就一定要反對民主社會主義。因爲，凡是反蘇反共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他必然就要站在壓迫與剝削自由者的一邊來反對大多數人的自由。』英法兩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就是一個好例。

大公報一再贊譽英法兩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是「保持着自由和民主的傳統」，兩國首相「堅持社會主義的政綱」，「已博得勞工大眾的信任」，外交上「出來緩和英蘇間的對立」，展望國際的「真正和平」。真的這樣嗎？看看事實罷，謝明先生曾經關於英法的民主社會主義做過結論說：

第一，工黨與社會黨的反動領袖是社會主義的叛徒，他們的抱負，祇是一塊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留心一點英法的經濟狀況，便可以知道。

第二，工黨與社會黨所領導的英法兩國已經完全倒入美帝國主義的懷抱，而且在歐洲充當着經紀人的角色，着手組織一個英，法，荷，比，盧，（將來是義葡以及北歐諸國）的西歐集團。

第三，它們絕沒有挺身而出「發和美蘇間的對立」，而是組織一條依附美帝國主義的陣綫，朝向東方，共同反對新民主國家，反對蘇聯。（註九）

這樣的民主社會主義，叫做什麼民主社會主義呢？這樣的民主社會主義，除了大公報奉之爲「好榜樣」外，那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加反對呢？有一點，民主社會主義符合於自由主義者民主，進步，革命，爲「大多數人自由」的基本信念的呢？從來就是奴役殖民地鴉片煙販子的一份自由主義，苦井裏那裏流出甜水來呀？至今艾德禮，貝文之流，就還是勾結美帝國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以進行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大騙子！

所以，自由主義者反對改良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更反對大公報所日夜想望贊嘆的英法式的那種反動的民主社會主義。

（註一）胡著，見第一章。

（註二至五）費濼萊：我的「自由主義」觀。（「時代」第八年第五期）

（註六）胡著，見第一章。

(註七)吳澤：自由主義的理論與歷史（「中國建設」五卷三期。）

(註八)徐秉讓：自由主義的演進（「中國建設」五卷三期）

(註九)謝明：論英法中間路線（「時代」第八年第五期）

第五章 自由主義的考驗

自由與自由主義的理解也罷，自由思潮的史的發展也罷，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也罷，所謂自由主義究竟不是僅僅文字遊戲而已；尤其是目下中國若干自號爲自由主義者，在美國主子「喚醒」之後，提調之下，究竟在「自由主義」這個商標招貼下打算向中國人民兜銷什麼老鳳梨？空論雖屬好聽，事實的考驗却也難逃的。

一 爭什麼，向誰爭，怎樣爭？

自由主義者要自由，究竟要誰的自由？向誰要自由呢？這兩個問題，答覆起來多麼簡單，要大多數人民的自由，向壓迫者統治者要自由。可是，前面說過，在自由主義的歷史裏，這「大多數人」的內涵，是有問題的。例如十八世紀西歐自由主義者，諸如法國的英國的，所謂「大多數人」或「人民」一般地是指「第三等級」新興資產階級而言的。所謂爭取「大多數人自由」，實質上祇是爭取資產階級的自由。而且，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初期，所

謂自由，究極地還祇是個人的自由而已。所謂「大多數人」或「人民」，應該是：在封建時代是新興資產階級和城市平民及農民這一羣；在資本主義時代，是小資產階級和工農無產階級這一羣。自由主義者要爭取大多數人的自由，是要爭取這一羣人的自由。如英法當年資產階級爭到了自己的自由後，平民農民的自由，他便不管了，這不能算是爲多數人爭取自由。大公報社論也標榜「以大多數的幸福爲前提。」可是，這個「大多數」是誰呢？正是杜徵先生所懷疑的：「受壓迫的個性，卽無自由而應該要求自由的人，那個「標主」是它自己呢？還是大多數人民？」大公報社論曾開出一張「大多數的幸福」的處方箋，中間也提出「公用事業國有」，「擁護課富的賦稅政策」等，完全是抄集英國工黨的政策，而且說：這些，「西方先進國家都已齊行了的。」其實，如前所說，工黨競選時揭櫫的「國營」政策，就害怕觸動獨佔資本家的利益，不敢施行，至今經濟危機，依靠美國的救濟過活，節約爵士克里浦斯在勸導「大多數人」束緊些褲帶，大公報說：克里浦斯的這種經濟政策，「已博得勞工大眾的信任，英國人民物質上雖受苦，但在精神上却很得到安慰。」（註一）我們讀到這幾句話，實在有點哭不得笑不得。大公報在諷刺英國工黨呢？還是在替中國「大多數人」畫符唸咒作精神的慰藉？」

事實上，中國的現勢，和十八世紀的英國，法國，美國不同，卽和今日的英國法國也不

同。數十年來，「第三階級」脆弱，腐敗，反動，惡劣不堪。尤其是近幾年來，貪污腐敗，專制獨斷，使得每個自由主義者「厭」惡到極點，近於失望絕望，悲觀頹喪，連司徒雷登也感到「士氣」消沉，担心政府有孤單寂寞之痛！可是，下層勞苦人民羣衆，可不是像自由主義者那樣消沉就算，他們再不希望，早已站起來，成羣結隊組織起來，自求幸福，展開具有決定形勢的戰鬥了。

就在這個現實形勢前，自由主義者臨到一次考驗了。如胡繩先生所說：

『人們如果是站在爭取多數人的自由的立場上，自當歡迎之不暇，但如果所想的只個人的自由，那就要發生問題了。我們可以看見，有自命爲自由主義的人，站在人民爭取自由的怒潮前，躊躇却步地想：這怒潮再汎濫起來時，會不會妨害到我個人的自由呢？於是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一面縱然深感到「壞政府」的統治有害於自由，一面又自以爲有義務要「預防」爭自由的人民破壞「自由。」』（註二）

寫到這裏，我們真不難想像到，後一種「自由主義者」的處境，把自己陷到這樣一付尷尬的地步。而且，這個尷尬局面，愈來愈尷尬；「壞政府」越搞越壞，怎麼辦？人民力量越來越大，怎麼辦？真是，國民黨可「厭」，共產黨可「怕」！「怕」「厭」比較，當然「厭」比「怕」好些，爭取誰的自由呢？口頭上儘管「以大多數的幸福爲前提」；事實上，

我有我的解釋，大公報社論的立場，態度，所以如此，道理就在這裏。

因爲不自由，所以要爭自由。爲什麼沒有自由，是被那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獨裁統治所剝奪去的。向誰爭自由呢？向那剝奪人民自由的獨裁統治者去爭取，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道理嗎？像大公報楊人楨等那樣的「自由主義者」們，就提出「向兩邊統治者和革命者同時要自由」的說法。這真如靡欣所說：這種「一進衙門就要各打四十大板」的說法，叫人有點莫明其妙。不僅是向「兩邊統治者」要，還要向「兩邊革命者」要，「兩邊」要，是中間；向「統治者和革命者」要，又是中間，「兩邊」反動，統治者不好，革命者也可惡，這是多麼激底的中間主義的說法。杜明先生銳利地揭發，說他們「用許多高調的空話來烘托出自己的高明，而其實則是鞏固了頑固的阻擋」的真面目。

「這樣，他們便站在「中間」，對上的身份是民主代表，用的武器是「民意」是「革命」；對下的身份是「通儒」，用的武器是「哲學」是「改良」，他們「絕不是兩邊倒，而是左右長處兼收並蓄，左右弊病都想除掉。」真是「自由」得很。」（註三）

這種向「兩面爭」的說法，似乎是如大公報所說的，夠「公平的原則」，其實，不啻是分散向統治者爭自由的力量，而且根本取消革命；根本取消爲爭取「大多數人自由」的前提，顯然，是有助於統治者剝削者的幫兇主義的反動陰謀勾當！

爭自由，爭什麼樣的自由呢？像英國法國當年，資產階級他們可以隨便欺騙玩弄出賣下層農民羣衆的自由，滿足了自己的自由就不管了；而且自己掌握了政權，就害怕人民的爭自由，就成天滿口和平，改造，想抹殺革命，「君子動口，小人動手，」想以此穩定他們的統治。因此，今天中國偉大公報之流的「自由主義者」們，他們面臨危險形勢前，正像船頭上騎鳥，走頭無路時，就想出今天西歐英國工黨法國許曼內閣的自由來，特別是英國工黨式的。（六月十四日）大公報社論題「第三勢力」在法國，中說：「觀察目前列強的政制，蘇聯是共產主義國家，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英國雖未脫離資本主義的本質，但已經是跨上社會主義的途徑而向前邁步了。」這種和平轉變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式的自由，確是最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統治，它，一面可以給人民炫耀一下社會主義的遠景，表示前進，控制人民對社會主義的鼓舞；一面標榜和平進步，免於「自由主義者」們革命的恐懼，實際上為資產階級行施反民主反自由，乃至勾結奴役世界人民的美帝國主義作反蘇反共的統治。這份工黨式的自由主義，正是大公報夢寐以求的想法。

可是，要知道，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看到資本主義民主的缺陷，也看到英法今日民主社會黨演出的這套把戲，更看到中國廣大的貧苦勞動人民大眾，已經覺醒起來，組織起來，成爲不可侮的強大的戰鬥力量，爭自己的民主，爭自己的自由了！再不

是民主社會主義這等漂亮的名辭所能欺騙的了，所以一個真正虔誠於自由，民主，進步的自
由主義者，再不夢想英美式的自由，也不會再受惑於英國工黨法國許曼內閣民主社會主義，
必然拋棄了自由主義，而追求以人民大眾為主導，爭取徹底的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義了。

實在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太艱苦了，因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再加上官
僚資產階級勾結得密切，中小資產階級如果不和人民羣衆聯盟來反抗偌大的壓迫勢力，是不
可能的；所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民族自由和土地自由的爭取工作，所謂「靠誰來實
行」的責任，自非由人民羣衆來擔當主導不可了，當然，小資產階級是人民羣衆最好的聯
盟。今日中國的中間層，自由主義者，主要成份是中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因此，他們所
要爭的自由，是進步的，充分的自由，即真正「以大多數人民的自由」為前提的新民主主義
式的自由。

爭自由，如何爭法呢？就是說：用什麼方法來爭得自由呢？大公報說：自由主義者「本
質上不崇信武力，揆起打來連手都不會搗。」並且還特別強調「反對意氣，霸氣與武器，相
信理性與公平。」還說：自由主義者愛好和平，爲和平犧牲自由都可，所以自由主義者的口
號是：「和平第一，自由第二。」一句話，就是說：要用改良主義的和平方法去爭自由。這
句話，就經不起事實的考驗的：

第一，自由主義者『本質上不禁信武力』嗎？大公報簡直太缺乏歷史常識。試問法國第三階級革命，虛梭的信徒們，不是都參加爲自由而戰的戰爭的嗎？美國解放黑奴的內戰，自由主義們身先士卒，出入鋒鏑。就是拿大公報所五體投地崇拜的英國民主自由說，從一七六八年權利請願書起，自由主義者不僅「動口」對國王毫不留情，口誅筆伐；而且「動手」，用「霸氣」和「武器」，兩次逮捕查理士第一，最後，還被人民審判死刑，送上了斷頭台，迎接了威廉第三的「光榮革命」。歷史上的自由主義者，爲自由，爲民主，爲進步，該流血時，無不慷慨激昂，洒他們最後一滴血的。程程先生說：『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應把自由放在第一，把和平放在第二；也可以說，自由主義者不到最後關頭決不放棄和平，一到最後關頭就必定毅然決然放棄了它。』（註四）「不自由，毋寧死」，爲自由而戰，爲自由而放棄和平，可以；可不能爲和平而放棄自由，大公報教人「和平第一，自由第二，」這不啻是教人放棄自由，像羔羊地順服，「和平」地，當主子的奴才，忍受剝削，忍受壓迫，這種說法，不是給自由主義者開玩笑不成嗎？胡繩先生說過如下的一段話，值得重視的。他說：

『自由主義與武力絕緣之說，其實是一方面來自資本主義秩序已經勝利了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一方面又是承繼中國古代的士大夫的傳統。資產階級已經勝利了時，爲了提防下層大眾的革命，自然就要主張自由不應該以武力取得。封建專制士大夫無論對君主

執政者如何不滿意，總只是苦口進諫，或退隱不問政事，決不會想到使用武力，因為士大夫與執政者在基本利益上是共通的，只有飢餓的農民才會「揭竿而起」，而當農民的武力與統治者的武力對抗着的時候，士大夫總是走在後一武力之下，不管這武力代表的是如何腐敗的皇朝。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如果看清楚了是要向那完全建築在武力上的黑暗統治爭取人民的自由，那麼就不能不認真重新考慮這一問題。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孫中山早已給了極合乎中國的實際的說明，他指出，在中國有兩種武力，有與帝國主義相結合的武力，有與人民相結合并爲人民所有的武力。有了前者就自然有後者，也不能沒有後者。自由主義者如果一味勸說人民不要用武力，自稱能用和平方法取得民主自由而送給人民，那麼他們豈非墮落成大公報那樣的騙子了麼？」（註五）

還有，范承祥先生以土地改革方式爲例，力斥改良主義的不可能：

『舉例來說，普通對土地改革有三種方式：一種是所謂「賜去地主」，即強迫沒收土地；一種是「挖去地主」，即加重土地稅，使不勞而獲的地主無法生存，而終於不得不放棄大部土地；一種是「買去地主」，即發行土地債券，收購地主們的田地。第一個方法是很激烈的革命手段，可能引起很強烈的反擊，甚至引起內戰；第二個方法就緩和得多；第三個方法更緩和得一點火氣也沒有。在一個自命爲愛好和平厭惡革命的自由主

義者，當然寧願採用第二三種辦法，而不願採用第一個辦法。其結果怎樣呢？俄國要化上三百五十年的工夫纔能完成土地改革，波蘭要八十年，匈牙利要百把年。自命爲自由主義者的份子——特別是那些高喊「假如必須用暴力纔能取得自由的話，我寧可不要自由」的甘地主義的信徒們，也許能有耐心等待，但是那些生活在地獄中的俄國，波蘭，匈牙利的農民們却沒有這樣好的耐性，等待不下去了。他們要用行動，用革命來早點澈底推翻他們的束縛者。：假如和平改良能完成改革的話，孫中山先生就不會喪志以死了。：一面反對現狀，一面又夢想暫時維持現狀，讓既得權益階級自己來慢慢改革現狀，那怎麼辦得到呢？這種做法在維持現狀者看來是大逆不道的，因爲你反對他的現狀，你要他犧牲一些東西來滿足他們所最看不起的「家奴」的要求，而他是堅決主張「寧予外人，不予家奴」的；在反對現狀者方面也無法加以同情和容忍，因爲你在大聲嚷叫，要他停止前進，停止活動，這樣有意無意，直接間接地使他的陣營對革命怠工，分散削弱革命陣營的力量，並給予維持現狀者以喘息整頓和加强的機會。這種做法是不能稱爲中間路線的，因爲這是在基本上有利於維持現狀者，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有害於反對現狀者的。」（註六）

根本上，改良主義，中間路線，就是有利於統治者有害於革命者的幫凶主義。

似乎，大公報又不能完全抹殺「革命」，所以他又倡「革命與改造并駕齊驅」說。他說「中國歷代的變動何嘗不是揚場「革命」，」『然而沒有平行的改造工作』，『革命有人熱心，改造無人留意』，所以都失敗了。可是『西方先進國家』，却能改造，所以成功了。這種說法，顯然是在強調「改造」，取消「革命」，正如杜徵先生所反責：『中國歷代換朝的變動是革命嗎？現代的革命是那樣的換朝嗎？牛頭不對馬嘴。中國歷代變動。像「英國查理士第一」以來，法國路易十六以來」嗎？牛頭不對馬嘴。英法成功是得力於改造，中國失敗是因爲革命太多嗎？錯了。這樣解釋歷史，用意好像是：改造改造很夠了』。（註七）

也好像是，今日中國自由主義爭自由，不要革命了？『改造改造很夠了？』

更現實的是關於內戰的問題。內戰，楊人楩先生說：『戰爭是集體的犯罪，內戰尤然。』（它引起）生命的傷害，物質的毀滅，經濟的崩潰，人力遭受蹂躪，外力的干涉，文化衰落，道德墮落。……道德墮落是無形的損害，然而也是最足以斷喪元氣的損害』。（註八）大公報等責斥內戰的壞處，大都是如此。至於反對這種責斥的意見，尙少見到，似乎；內戰只有破壞損害等退化的作用，沒有任何進步的意義，所以，一般人，因爲痛恨內戰厭惡內敵，就此反對武力，反對革命，而憧憬改良主義的幻景，覺得假如必須用暴力才能取得自由的話，我寧可不要自由。」「和平第一，自由第二」這樣，一腳滑進改良主義的泥塘裏去了。

最近，龐欣先生深感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提出了嚴正的非難，說這無條件反內戰論，完全是皮相之見，似是而非的說法。爲什麼呢？他說：

「我承認內戰對於社會生產力一般文化水準及人口質量性能三方面的嚴重損害（如同楊先生們所指出的），但我却認爲：1. 內戰是一定社會制度下的社會階級矛盾的暴露；2. 內戰是解階消這種社會（級）矛盾萬不得已的手段，其目的在作爲一個新社會的催生劑；3. 因此，當我們看內戰對於一個社會是演着促成進步的作用，抑或是演着加速退步的作用這一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憑藉內戰所帶來的損害程度來決定，而應當本着這個內戰究竟帶來了解放社會生產力，抑或是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結果來決定。明白些說，如果某一個國家的社會生產關係早已不允許其社會生產力有何等發展，甚且早已成了後者的束縛，而在從事內戰以後，它的社會生產關係依然是繼續阻害着社會生產力，則在內戰過程的人口物質以及文化成果的大量消耗墮落，就可以說是社會的純損失；而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係的矛盾，反由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得到弛緩，並由是而便利了原有社會關係的存在與加強——在這種情形之下，內戰就是退步的、可詛咒的。反之，倘若內戰的結果能夠革掉傳統社會關係的命，使社會生產力能得到解放，那這個內戰便是進步的，應當擁護的；在這個內戰勝利完成之後，生產建設必然可以大大擴張，而內戰中大量耗損的人力物力便可很快地補償過來，而新的更

好的文化水準和道德觀念也可很快地建立起來。所以，如果智識份子能夠深入些看問題的話，那就曉得今天不能抱楊人棟和施復亮等先生那樣的『自由主義者不應支持內戰，必須用盡一切力量去設法結束或縮短內戰；假使他無法阻止內戰，至少不應助長內戰』的態度，而應當用盡一切力量去設法幫助爭取內戰的早日勝利結束，使社會生產力能從束縛着它的社會生產關係中解放出來，使整個社會因內戰而走上一個更新更高更進步的階段。』（註九）

二 幾個具體問題

首先，他們提出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的並重論來，把二者分開來對立起來，說英美有政治自由（民主）而無經濟自由（社會主義）；蘇聯有經濟自由而無政治自由，中國須把兩者之長，兼收並蓄，意思就是說，採行民主社會主義，英國工黨就是這種民主社會主義最好的榜樣，可是不好意思直接說出來，却扭扭妮妮，轉灣摸角，借着中山先生的「三民」，說什麼列寧只寫了一部民生主義，甘地只寫了一部民族主義，傑弗遜只寫了一部民權主義。『現在中國把三者兼收並蓄了，就像英國工黨一樣，天下之美皆歸之，盡美盡善了。顯然，這是英法民主社會主義的中間路線的騙局，必須暴露它，揭發它。』

就社會科學常識說，政治制度是從經濟制度取得其存在的基礎的。封建政治制度建立在

封建經濟制度上；近代民主政治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上，同樣，社會主義政治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上；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不容割裂孤立，此其一；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二者皮肉密結，是一個歷史範疇；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二者也密結着，是一個歷史範疇，怎能把兩個不同範疇的東西相提並論呢？此其二。就史事說，如杜徽先生所說：

『可憐這位執筆先生，缺乏社會科學常識。俄國革命是歷史的一階段，有經濟，政治，文化種種內容，不能以民生或經濟平等一語概之，這是常識。怎麼會說出一列寧只寫了一部民生主義』這話來呢？傑弗遜也不只寫了一部民權主義，他參加美國獨立戰爭是民族。一八〇三年以一千五百萬元從法國購買了路易士安那一塊廣袤的土地，擴張領土並發展了資本主義，這是民生。甘地代表印度的資產階級，也不只寫了一部民族主義。它抹煞了歷史階段，社會本質，革命內容，抽象而強制的使「三民」各自孤立，這是刺謬事實的。』

杜先生這種指斥是非常正確的。所以，最後，杜先生也暴露說：

『每個革命都有其政治，經濟等內容，是一體系的，問題要看政權落在誰人手裏，誰浮起來，誰沉下去；實行的是什麼社會制度。譬如資本主義的英國，工黨執政還是資

「本主義，它的社會政策還趕不上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策。擴大國家是資本家的願家。財產仍然集中，所有權仍然神聖。經濟平等的口號根本是欺人之談。離開政權的性質，而空談理想，肢解社會構造，美化爲獨立的抽象原則。這樣「中間」一下，掛着渺茫的空想。在思想上變成一名中國版的英國人了。」（註十）

其次，還是從英國工黨抄來的一套，所謂「混合經濟制度」論。大公報一批人提倡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者「混合」起來，把資本主義和平轉變「改造」成爲社會主義，所謂「選擇性社會主義」是。這種說法，也是「空談理想」，也是妥協，騎牆的「改良主義」和「中間路線」的夢話。這點，范承祥先生也已指出，是件不可能的事。他說：

『1.當作一種社會制度。看的經濟制度，在它本身性質上，在它的基本結構上，都無形中設定了一個限界，是一種經濟制度與另一種經濟制度的分水嶺。本質上實行某種經濟制度的國家，不能同時又採行他種社會制度。以私人企業爲中心的經濟制度，即使我們已明白理解它那自由競爭的弊病，但却顯然無法依據採行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設計。2.生產上採取資本主義技術上的優點，分配上採取社會主義公平的優點，那是將近一百年前曾經由英國大經濟學家 T S 彌爾所夢囈過的玄想。社會財富的分配形態取決於社會財富的生產形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出來，再依社會主義的方式來分配，在

今日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那是根本辦不到的。」（註十一）

明知「辦不到」，爲什麼還要「辦」呢？奉國工黨已經「辦不到」，此路不通，今日中國大公報一派的自由主義者確存心捧場，捧工黨，捧艾德禮，簡直捧得上天，想推動中國也採行這種「偉大理想」的制度呢？究竟爲什麼呀！前文不是一再暴露過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反動陰謀嗎？再引范先生的一段結論罷：

「英國的現行社會條件和社會基礎既然始終沒有發生過基本的變化，所以它的現行經濟制度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其所以要故意提出混合經濟制度之類的名辭，不過是意圖一新勞苦大眾的耳目，緩和一下戰後勞苦大眾要求公平的情緒而已。」（註十二）

大公報等要去仿效，其目的，拆穿西洋鏡說：也「不過是意圖一新勞苦大眾的耳目，緩和一下戰後勞苦大眾要求公平的情緒而已。」

再次，大公報一系列的自由主義者，宣稱「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號召中國仿效。理由有三點：第一是反對英雄崇拜，說：「自由主義與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第二是「人民與統治者間是由招標而發生合同關係的。」必要多數投票人。第三是中國幅員太大，一黨治不了。「一黨專政統治全國有其根本的不可能處。」現在分別論來。

第一，反對英雄崇拜，就夠表示民主嗎？一個爲大多數人民爭自由爭民主的領袖，爲人

民大衆由衷的尊敬與崇拜，是不民主嗎？」希特勒的黨徒懸其領袖的照片令人舉臂示敬，是被迫的崇拜，「是不民主，那末『田納西流域農民對羅斯福之死而流淚是由衷的愛戴』，不是民主嗎？杜微先生也懷疑提出兩個實問題，請問：俄國農民可不可以崇拜，或愛戴列寧？俄國農民爲列寧之死而流的淚，與田納西農民爲羅斯福之死而流的淚，是否化學成份有所不同？請問：岳飛打退了金兵，中國人可不對他崇拜？許多自由主義者不在崇拜耶穌拜羅梭，華盛頓和林肯嗎？所以，杜先生說：『我覺得反對英雄崇拜，從小處落墨，一句話，就是反對既成的政治領袖，而不權衡英雄的價值。』可見，大公報的這點理由，完全是架空的，不值得一駁的僞民主僞自由。

第二、贊成多黨制，就夠民主了嗎？杜微先生說：『英美社會有階級，人民利益不同，所以產生了多黨。多黨並存，形式民主，內容並不一定民主。五個人五個意見是民主，五個人的意見相同行動一致，也是民主。英美式的民主論客，不了解剝削消滅以後，人民的利益根本相同，已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多黨。他們是形式的民主論。擁護英美式的多黨，卽擁護資本家的多黨輪流去管理國家，置大多數幸福於不顧』。這算得上什麼民主呢？在有階級社會中實行一黨制，當然是不民主的。像美國那樣的多黨制，也不見得就是民主。杜微先生說：『就像美國的多黨吧，那個銅臭的選舉，沒有金錢或做有錢人的走狗，你能自由走

上政治舞台嗎？美國人民，選擇來，選擇去，還不是那兩個一丘之貉的民主黨或共和黨？他們哪個是「貨真價實的應徵者」呢？不錯，資本主義多黨有看競爭，但本質上是有產者壟斷政權的前提之下競爭，並且也可以通同作弊」。（註十三）

范承祥先生說得更深刻，他說：

「十九世紀後半葉迄今的歷史告訴我們，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無論如何多法，總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的；至於所謂代議政治，無非是說一切有關工商利益的法案都必須由資產階級代言人佔據大多數議席的議會予以通過。政黨與議會都有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所把持，這哪裏談得上什麼民主不民主。在這種制度之下的政治與經濟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政治與經濟自由；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是根本上既無政治自由，也無經濟自由的。至於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由於政權掌握在勞苦大眾的手中，所以勞苦大眾是有政治與經濟自由的」。（註十四）

今天的中國，廣大的人民大眾已經自動起來爭自由爭民主，進步為新民主主義性質的，而且正在進軍的國家了；大公報等還拿英美式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來炫耀中國人民，不論「多黨」「十黨」，「一百黨」，也騙不了誰了。過去國民黨一黨專政，不民主；今「國、民、青、三黨聯合」了！請問：民主不民主呢？

第三，中國太大，多黨分治，就算民主了嗎？就事實說：蘇聯比中國大好幾倍，是一黨在治，不民主嗎？治不了嗎？沒有了剝削，沒有了階級，人民利益根本相同，不可能也不必要有多黨；今日蘇聯國內政治安定，國力之強大，比諸英美如何？英國的文官制度，大公報贊譽之爲「理想的種籽」，說「艾德禮及其同僚之可以隔夕即取邱吉爾而代之」。中國呢？缺乏這個制度，「革命不已，流血不已」，各不相讓，武力抗爭着，實在不像話。這裏，大公報一羣形式民主論客忽視了前面所指出的，英美式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基本上都是資產階級的多黨，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英國的保守黨和民主社會黨，都是與人民大眾無關的黨，艾德禮和邱吉爾的交替，不過是「資本家的多黨輪流去管理國家」而已；中國今日的黨爭，則是有着少數統治與多數人民；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官僚資本和絕大多數人民的不同性質，不同階級的黨爭；不是會議制協商制可能解決的，這又什麼不可思議的地方呢？大公報等把今日中國和英國相提並論，想把英國的「理想的種籽」，移植到中國來，不是裝糊塗！又是什麼？

今日中國正面臨着革命與革命的生死鬥爭的場面。一面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產階級聯盟的反動力量，一面是以人民大眾爲主導與小資產階級聯盟的革命力量，二者激烈地鬥爭着；自由主義者該怎麼好呢？胡繩先生說得很好：「事實很清楚的，所謂自由主義者

在今日中國不管有多少人，自身總是並無力量來實現自己的理想的，在今日的社會條件下也絕對找不到一個有力的自由資產階級來做實現自由主義思想的英雄」。自由主義者是不能獨立起來，在兩個力量之間有所可爲的，他必然要投向一個，不是前者，就得是後者，聯合反動？還是聯合革命？兩條路，由你決擇。

前面說過，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是反封建，反官僚資本反帝國主義法西斯，照理，「應該」，也可以說「本來」是決擇人民大眾革命聯盟的路的。可是，有一些自命爲「自由主義者」的人，却選擇了反革命聯盟的路呢？因此，不應該有問題的，現在混亂了，就成問題了。於是，自由主義者參加革命聯合戰線的問題，確實是具體實際而又迫切需要辯解的一個課題。

前面，我們已插繪出自由主義者徘徊躊躇在兩種力量之間，一付尷尬相了，一些認識不深不淺，意志薄弱，氣節不夠的「自由主義者」，在統治暴力壓迫下，失去正義理性而「自行失足」的，爲數不少。例如楊人楩教授其人，就是個好榜樣。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文中說：

「果能容許自由主義之存在，自由主義者至少是國民黨政權所需要的反對派」。還說：「自由主義可能是件使勤儉者感覺煩痛的東西，然而爲着保全民族的創制力與自信

心，爲着促進民族文化，爲着消滅暴力，稍有眼光的執政者，必須忍受這一點點頭痛而容許自由主義之存在」。

這段話，說來多麼可憐呵，誠如胡繩先在所分析：假如自由主義真如這裏所寫的一樣，那麼自由主義真是何等可憐的「東西」啊！設想一下罷，在政協決議已被撕毀了一年多時，自命爲自由主義者的人，居然還走到這個窮凶極惡，真象畢露的統治者面前說：請你「容許」我「存在」罷，容許我做一個你「所需要的反對派」罷，雖然也許會使你「感覺頭痛」，但只是「一點點」而已。那並不是不能「忍受」的。而我的用處大得很，除了民族啊，文化啊的百年大計以外，還可有助於你「消滅暴力」呢。——如果自由主義者的「出路」說穿了無非如此，那麼，張君勱，曾琦不是已經爲這條「出路」作了「光榮」的示範了麼？

胡繩先生說：他們「一方面在統治者面前，凜於其實際的權勢，和久壓的積威，便感到自己的無力對抗，明知它已腐朽透頂，也還不敢對它全然拋棄希望之心。另一方面，在人民大眾面前，又總覺得自己的優越，總覺得不應該是自己依靠人民力量，倒該是人民服從自己，受自己的領導；而在人民大眾按照他們的覺程度與團結力量而鬪爭起來的時候，又總覺得人民的行動不合自己的理想，不合自己的脾胃。——如果要這樣地自陷在這兩道「關」前走不出去的話，我們敢斷言，「自由主義」者除了葬送自己外，別無出路」！

時至今日，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的醜相，已完全暴露無餘，尤其是近來全國學生，文化，教育，工商各界反美抗日，和抗聯司徒大使憫憫中國的談話，罷課，遊行，示威，宣言，……多少「自由主義者」在這形勢前惶恐了，惶恐廣大羣衆的覺醒和反帝反統治的革命力量；惶恐帝國主義和政府對中國統治的前途。恐而不覺醒是徒然的！自由主義往那裏去呢？僅僅「惶恐而已矣」嗎？

一個自由主義者，到今天，還不毅然決然割斷對反動統治和帝國主義的幻想，站起來，迎前去，尊重人民的覺醒與力量，和人民在一起，參加革命聯合戰線，奮力反帝反統治，爲民族求獨立人民求解放，獻身於民族自由，土地自由，成爲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還隱瞞什麼？

胡繩先生如下的一段話，可以說是給自由主義者一個嚴正的必要的警告：

『目前中國人民大眾的爭自由爭生存的鬥爭，在本質上，是展開於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支配勢力，也就是爭民族的真正自由，又一方面是反對封建性的土地剝削制度，也就是爭取土地的自由。這兩點是使中國成爲自由的國家，使中國人民成爲自由的人民的根本關鍵。近二三十年來的統治政權，一方面依靠帝國主義，一方面又以封建性的土地剝削制度爲基礎，所以成爲束縛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自由的枷鎖』

。中上層的知識分子，在經濟生活及其思想感情上既常與侵略和支配中國的帝國主義保有着千絲萬縷的關連，又常與封建性的土地剝削制度有着血緣的親疏。這就使他們雖不便公開反對爭民族自由與土地自由的目標，但一到人民大眾真的爲這些目標而從事積極的鬥爭時，他們就皺眉擰肩，「過火」啊，「操之過急」啊，種種想法就出現了。但是我們必須嚴正地指出，如果不是對民族的自由和土地的自由採取積極的態度，我們簡直不知道，一個人在今日中國如何有臉來自稱是爲自由而奮鬥。一切進步，民主，自由的美好的字眼，脫離了人民大眾的實際鬥爭，最多也只是知識份子拿來裝璜自己的禮服的標化，如果不至於像民社黨，青年黨那樣拿來作爲向富政者簽訂賣身契約時的裝飾語。』（註十五）

（註一）上海大公報一月十六日社論：「國際第三方面勢力的抬頭」。

（註二）胡著，見第一章。

（註三）杜明：評大公報對自由主義的看法（「時與文」二卷十七期）

（註四）程程：自由主義與中國現局（「時與文」二卷十六期）

（註五）胡著，見前。

（註六）范承祥：亟待澄清的幾個問題（「時代」第八年第六期）

(註七) 杜微：論一種自由主義（「中國建設」五卷五期）

(註八) 楊人楩：內戰論（「觀察」期）

(註九) 龐欣：總結關於自由義的論戰（「讀書與出版」第三年第四期）

(註十) 杜著，見前。

(註十一) 范著，見前。

(註十二) 杜著，見前。

(註十三) 范著，見前。

(註十四) 胡著，見前。

(註十五) 胡著，見前。

第六章 自由主義的揚棄

綜上看來，「自由主義」問題很明顯的，不僅是一個思想理論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尖銳嚴重的現實政治問題。因此，應該提出的問題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既虔誠於正義理性，追求真理，爲大多數人的自由而獻身，那麼，在新的民主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等的革命運動中，是否還需要自由主義的旗幟呢？答案該是否定的。

爲什麼呢？首先自由主義不是特定社會革命的特定的主義，祇是一般受壓迫者反壓迫求自由的基本精神而已。

如前文所說，古代希臘，由於奴隸主國王貴族的專制獨斷，就有喜庇亞，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以及梭倫的自由思想；中世歐洲，思想與信仰，被封建貴族基督教及其神學所專制獨斷，就有哥白尼威克里夫薩佛那羅拉等思想自由的號召；從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權利宣言，人權宣言，乃至美國的獨立宣言，自由思想，到達高潮。事實上，中世末期，新興資產階級進行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其民主主義的內容，在社會結構上，他要推翻

封建制社會建立新的資本主義社會；扶持其工商業的發展，建立自己的政權，普及教育，宣傳民主自由思想；常年搗毀的旗幟，也標榜自由，而且是「人民的自由」；其實，這人民，如前所說，祇是資產階級自己，勞苦人民羣衆不在其內的。可是，他們「人民」二字，號召革命；革命的目的，不過是求得資產階級開工廠做生意，賺利息的自由，革命成功後，所謂「民主政治」，也不過是給資本家們剝削人民壓迫人民的「自由」而已，可是，當年，多少人民羣衆，是虔誠於自由，而參加革命流血犧牲的呵，結果呢？「自由」二字的涵義是資產階級曲解了，人民對「自由」二字，也還是糊塗模糊的了。所以，現代科學發達，人民對自由的認識，由朦朧而科學性與理解了；因此，人民羣衆就覺醒起來了，由自在階級成爲自爲階級，再起來組織自己，進行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其社會主義的內容，廢除私有財產，消滅資產階級的剝削，取消資產階級的假民主，澈底實行人民主義的真民主，求得人民大眾的澈底的自由與解放。

由此可知，自由主義是從古到今，在階級社會的革命運動中，當作反壓迫求自由的基本精神而貫通着古代，中世，近代各個社會和民主，新民主，社會各個主義的。根本上，不是特定的社會革命的特定的主義。歷史上有過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有反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有什麼「自由主義革命」沒有呢？

自由，這個概念既是隨着歷史發展而發展，牠由直覺素樸朦朧模糊的理解進而爲科學性的理解的。當社會科學發達，當聖門傳立葉等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由馬克斯恩格斯等發展成爲科學的社會主義，往日人民大眾爭自由，參加革命，是朦朧模糊地進行的，不知向誰爭？如何爭？爭什麼樣式的自由？……一次次被出賣，一次次被犧牲，現在，明確清楚科學地把握自由的理論和革命實踐，必成不敗，自由，成爲科學的思想了。前面（第三章）不是說過嗎？『自由，成爲科學性的思想時，他就成爲今後人類爭取自由的精神武器，成爲裁衡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自由主義的尺度。自由，當正成爲這樣的科學思想時，他就不叫做自由主義了』。具體些說，科學的社會主義，早經解說，人民自由的真正現實，是由人民大眾堅決執行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而獲得，今日世界上已有六分之一的土地和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得利害實的考驗。落後國家如東歐以及中國，要完成革命，澈底實現民族和土地自由，也祇有堅持人民大眾革命的主導，聯盟反帝反封建，完成新的民主主義革命，東歐諸國，已次第實現。當然，祇有由人民大眾爲主導的民主革命，才不會走樣，推向前進，步入社會主義之門，直趨公天下，自由王國的境界。

今日，是人民時代，人民世紀，是人民掌握革命的時代，是新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等革命的世紀，人民已經覺醒，科學已經發達，如前所說：過去舊民主主義曾經自由主義混淆

過，現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可不容和自由主義絲毫的混淆；嚴格地講，自由主義的自由理念，基本上是贗騙的非科學的，所以說，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是虔誠於正義理性，繼承發揚着優良傳統，砥礪向上，不斷地前進，和新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聯盟革命，實踐教育着，終必進一步成爲新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如果一個自由主義者贊同或參加新民主主義或社會主義革命聯盟，而把自己約束於自由主義，不再前進一步，那他對於自由的理解，還是贗騙的，直覺的，一言以蔽之，非科學的。而且於革命建設有莫大妨害的。因爲，不把自由主義早日作科學的解釋，澈底終結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還是贗騙地保留着自由主義者自尊自傲的這分身份和地位，就有如次的幾個毛病：

第一、阻礙真正熱誠於爭取自由的革命運動，不能更大的發揮其戰鬥力量，是革命的一分損失。

第二、混淆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阻擋了知識份子趨向革命主義的直接的路程；

第三、給一些模糊不清的知識份子，保留着一個妥協，苟安，等待的幻影，看不到不想看到革命主義的前程；

第四、而且保留着一條模糊不清的岔路——所謂『中間路線』，成了帝國主義封建法西斯統治者們的俘虜。

第五、和新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對立，這就是分裂，這就是取消，分裂革命，取消革命，間接就是幫助反動幫助反革命。

所以，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在今日科學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時代，是該終結的時候了。在今日中國革命建設形勢中，是更該完全擯棄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號稿於憶韻齋

重 並 設 建 與 判 批

☆ 新 認 識 叢 書 第 一 卷 ☆

對於當前種種錯綜複雜的，有關於文化思潮諸問題，亟待予以科學的分析與批判。本叢書即以此為編輯重心。從學術立場，用正確觀點，簡潔筆調，對有關各問題作嚴正而深入的分析與批判，使廣大的知識羣有新的認識。本叢書各冊，均由海內外具有專門研究的教授，名家執筆，益見充實。

論 胡 適 與 張 君 勸

夏 康 農 著
基價二元四角

論 知 識 份 子

田 家 益 著
基價二元四角

論 優 生 學 與 種 族 歧 視

周 建 人 著
基價二元四角

論 哲 人 政 治

李 柏 年 著
基價二元四角

論 自 由 主 義

宋 魚 著
基價三元二角

戰 後 經 濟 學 說 (即 出)

李 正 文 著
基價一元

報導與分析並重

☆ 國際現勢叢書 ☆

在急激變動的國際現勢中，人們都關心着世界的未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關係；蘇、英、美、日特別是中美之間的關係；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及全世界範圍內民主與反民主抗爭等諸問題，都希望能得到明白而正確的分析與解答。本叢書的編印就爲了適應這些。執筆者均爲國際問題研究專家，每冊根據實在資料對每一問題都給予解剖與評述，爲關心國際現勢者必需的讀物。

中 美 之 間	梅 基 著	華 元 二 角
世 界 的 逆 流	貝 基 著	遜 元 四 角
反 扶 日 論	呂 基 著	燿 元 二 角

2267



1.94
7

基本定價

3210